

逝者如斯 未尝往

抚去历史的烟尘，遥

望那一个个即将或已经

远去的背影。回望一段

历史，寻觅大师的身影。

在他们身后的历史中，

他们也许被遮蔽了。但

是，他们的成就与辉煌

却直至今日仍然熠熠生

辉。他们学贯中西，他

们个性张扬，他们以中

华崛起为己任。他们以

教书育人为天职。他们

大气磅礴，他们情感充

溢，他们是一个个历史

的坐标，他们是中国文

化的脊梁。

逝者如斯未尝往

陈远◎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K825.4
42

逝者如斯之记

陈远
◎
著

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逝者如斯未尝往/陈远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613-3707-3

I. 逝... II. 陈... III. 文化-名人-访谈录-中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8451 号

图书代号:SK7N0010

责任编辑: 周 宏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版型设计: 祝志霞

插 图: 张 娟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92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3707-3

定 价: 20.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序言 自我交待

这本集子所收录的文章,大多数是我刚刚进入史学研究时的一些习作,为实事求是计,我最初给这本书取名为《练习簿》,但出版方以为此名过于老实,才有了现在的名字。现在把过去的文章汇总起来,竟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对于我个人来讲,回过头来看这些稚嫩的习作,仿佛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看到自己如何一步步在史学的道路上跋涉过来,但是若只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祸之梨枣,实非我所愿。更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文章的时候,竟然还有感动,民国期间的那些旧人旧事,依然还能打动我。而我之所以一头撞进民国史的研究,也是因为民国史的魅力那么强烈的打动了我。回想打捞这些藏在历史背后的细节时,我的那些感动、感慨、唏嘘以及愤怒一下子又都浮上心头,现在我愿意把这些感受与你们一起分享,亲爱的读者们。

书自有其生命,在此我将此书原委做一说明,算是自我交待。此书最初编定始于2002年,彼时,我毕业不久,回顾所来径,编了这本小册子,亦做自遣之道,亦做自我总结。当时取名《废墟上的歌唱》,自序如下: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每到学期末,辅导员总要让我们写一篇个人总结,汇报一下个人在上个学期的情况。那个时候,我的个人总结上总是一片空白,一来是因为我对于这种形式的反感,二来也是因为一个学工科的学生读这么一些“杂书”,多少也显得有点“不务正业”。

但是现在,我却不得不写一篇类似的总结来交待一下这本书的内容了,以便读者在阅读之前对本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这本书的内容,大概可以用谢泳先生一本书的名字来概括,那就是谢泳先生作品:《逝去的年代》,因为书中所描述的,大都是发生在过去的

事情。余生也晚，没能赶上那个年代，但是在我的阅读记忆中，过去的年代中却有很多事情让我们这些作后人的于感动之余，颇生惭愧。这种感觉，我曾经与许多学人有过交流，他们大都也有这样的感觉。看来并非是我个人觉得“时不我遇”。怎么办？历史不会重演，社会也不可能再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但是，表达一下对过去的怀念，以便我们后人在做事的时候有个借鉴，知道事情还可以这样处理。我想，这总还是可以的。

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书名：“歌唱”在辞典中有两层意思，第一种是“唱（歌）”，我是不会的，听听还可以；第二种，是“用唱歌、朗诵等形式颂扬”，用来说明我的本意虽不是十分准确，但也算贴切了。世上让人看不惯的事情太多，但你总不能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挑起来没完，那样的话，只能算是“捣乱”，而谈不上“建设”。况且，一个人反对什么，是可以从他赞扬什么中看出来的。说完歌唱，接下来再说“废墟”，废墟，在辞典中的意思是这样的：城市、村庄遭受破坏或灾害后变成的荒凉的地方。这和我的意思也有点出入，我要说的，不是城市和村庄，我感兴趣的，是文化发展的脉络。废墟，是我的背景，我是站在一片文化的断壁残垣上说这些话的。至于说为什么这么说，我想，凡是对“反右”、“文革”这些运动有所了解的人大都可以明白，在此不多赘言。

我还想说说与我接触较多的几位学者，不是拉虎皮做大旗，而是不得不说。分别是：谢泳先生、谢志浩先生、高建军先生以及王长生先生。余也孤陋，知道谢泳先生始于上个世纪的1998年，并不知道在这以前谢泳先生已经以其《教授当年》和《学人今昔》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谢泳先生尝劝我专治一学，我当时委婉拒绝。这并非出于矜持，而是昔日的我觉得自己读书太少，基础太差，离专治一学的程度还有一段距离。谢志浩先生和高建军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我进入史学一途，受二位先生影响甚深。现在的老师和过去的老师在很多地方已经很不一样了，现在是学生不像学生，老师不像老师。谢老师和高老师在很多地方，还有许多过去教授的影子。两位老师于我在人生态度、人生选择上影响莫大，回忆起来，感慨良深。王长生先生，世人多不知，先生是高人，能达到“人不知而

不愠”的境界。所以在我眼中，王先生乃一真正学者。王先生也是“二十有志于学”，而今年过五十，数十年如一日专治私立教育史，自费跑遍全国各个大小图书馆、旧书摊查阅购买资料，其史料搜集之全，令人瞠目。王先生是最早劝我专治一学的学者，并指责我的理由“实在是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王先生之耿直，由此可见一斑。

我要说的，大概就是这些。我想，说我们的身后是一片废墟，这几位先生大概都会同意。而亲爱的读者，读完这本书，你会作何感想？

此次重新整理，反加收近年来所写的文章，于旧做来做修改。“不悔少作”的原因，在于为存一个真实的“过去之我”。个中简陋，望读者诸君谅我。



目 录

自 序 自我交代 1

第一辑 废墟上的歌唱

百年回首大公报 2

清华风物今安在 13

大师之道与大学之道 18

从胡适日记中的一则剪报谈起 29

胡适的“不讲情面” 35

梅贻琦的选择 37

生死皆寂寞的教育思想家 40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灵魂 44

傅泾波：人生知己应如是 55

黄炎培：以教育始，以政治终 62

谈谈耶鲁的独立精神 66

不同的大学，相同的命运 69

令人怀念的老报馆 73

历史的吊诡 75

此般师生此般情 78

“性”博士的文化气魄 82

家学的消亡 85

看那一群风流的人物 90

逝者如斯之记

- 季羨林的晚年心境 94
费孝通的两个世界 97
从科举废除到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 100

第二辑 个人阅读史

- 一代通人许倬云 109
何兆武的悖论 112
这个自负的人，这本值得自负的书 113
刀割到自己方觉痛 116
史景迁的匠气 120
这般朝花夕拾的草民记忆 123
读《鲁迅书影录》 126
老南开人的一代风骚 129
砍柴十年为磨刀 132
从思想操练到学术地图 134
宽容的谢泳 136
对话的意义 138
厚道智效民 140
一部微缩的社会演变史 142
震撼心灵的细节 144
读书也为稻粱谋 147
封建礼教压制之下的人性之美 149
孔庆东的“现代寓言” 152
寻求对话的可能 154
关于教育的几点随想 156

逝者如斯堂记

不单单是人格问题 160

第三辑 非关读书

与唐德刚先生谈历史 163

黄永厚：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 167

李宗吾还原一段民国史 173

口述历史二人谈 176

《逝去的大学》回眸老大学余韵 182

《李宗吾新传》自序 184

我们只能是自己的道德法官 186

逝去的大学序 190

首先是兴趣，然后才是意义 193

他们走了，留下一些往事让人怀念 196

王芝琛的心愿 198

话说名门与财富 201

吾师谢志浩 204

历史是想象出来的 207

我的文学观及其《书生意气》 209

一塔湖图 213

一次伤感的采访 216

逝者如斯
来者如彼

第一辑

废墟上的歌唱



百年回首大公报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中，是很重视五年、十年、百年这些纪念日的，北大百年的时候，轰轰烈烈的活动自不必说，单是坊间出版的书籍就多不胜数，清华的百年还没有到，关于清华的书籍就开始一窝蜂地出版了，估计到清华百年的时候更会有许多好书付之梨枣。今年6月17日是大公报创刊百年的纪念日，但是奇怪的是纪念活动既不热烈，也不轰动，坊间出版的书籍，限于我能看到的，仅有曾任大公报主编王芸生的哲嗣王芝琛先生编著的两本书，一本是《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另一本是《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



民国时期的《大公报》

说起大公报，有几位先贤不可不提，那就是创始人英敛之、新记公司的创业者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以及后继者王芸生。

英敛之(1867-1926)，名华，字敛之，又号安蹇，满洲正红旗人，生于北京。20岁左右由习武转为学文，受今古群书影响，愤世嫉俗，尤其痛恨那些“奸贪误国，豪暴虐民”的达官贵人，矢志终身不做官。

1901年4月，英敛之在天津开始与人筹划创办报纸。至1902年6月17日创刊，这便是大公



报。在大公报创刊号上，英敛之发表了署名文章《大公报序》，说明办报宗旨。文章说：“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在创刊第二天的《大公报出版弁言》又明确表示：“本报但循泰东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之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随后的大公报宣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革命（但同时反对残害革命党人），倡导社会改革，确立了大公报“敢言”的特色，其论说无论正确与否，都表明了一家报纸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观点。可以说，以后以“文人论政”为特色的新记大公报，从这里便露出端倪。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英敛之办报的兴趣随之减弱。1912年2月23日大公报实行改版，改以中华民国年号纪年，英敛之便退出了大公报。此后隐居香山。1925年与马相伯成立公教大学（辅仁大学前身）并担任校长。1926年1月10日去世，享年59岁。

吴鼎昌（1884—1950），字达荃，笔名前溪。生于四川华阳（今成都），原籍浙江吴兴。在介入大公报以前，可以说吴的兴趣是集中在从政上，即使在1926年9月1日，他出资5万元与胡政之、张季鸾以新记公司续办大公报的时候，吴也没有失去从政的兴趣。但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人真是有意思，干什么就讲干什么的规则，所以当吴与胡、张二人一起接手大公报以后，就把心思转移到办报上来了。当时吴鼎昌是董事长兼社长，应该说权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吴这个社长好像并没有什么公权力。在他与胡、张的约定中就有这样一条：“吴任社长，但一切用人行政都由胡政之主持，吴不加干涉。胡的名义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则任总编辑兼



吴鼎昌

副总经理。吴只是帮助写社评，言论方针由张掌握。”那么吴鼎昌做什么呢，吴只管白报纸的订购，这个在今天看起来对于办报无足轻重的活计，吴津津有味地干了9年，直到1935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实业部长。吴上任以前，在大公报上刊登了一条启事，声明辞去大公报的社长职务，过去的人们好像对于做官有一种看法，以为做了官就不能做别的事情了。不是说做官有多么不好，而是怕做官以后再做不好别的事情。现在这种情形恰恰是颠倒过来了，好像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就仿佛什么都能做好似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至今我没有发现有史料说吴鼎昌在做官以后撤回了最初的5万元投资，但是吴做官之后便不再过问大公报的社务倒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在论及吴鼎昌时说吴鼎昌办大公报是作为从政的资本，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吴或许有那样的初衷，但是同时吴确实想办一份成功的报纸。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吴完全可以在任实业部长以后把最初的资金收回。从吴接办大公报之前对报纸的认识上，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吴认为一般报馆之所以办不好，主要是因为资金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人的手短，拿了人家的钱就要为人家说话。所以最初吴拿出5万元办报，不拉政治关系，也不收外股。大公报之所以能够做到不偏不倚，跟吴的这种认识有很大关系。因为经济上独立，说话相对就自由。当然，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为这种不偏不倚提供了条件，那时的社会还是有一定的弹性的，有了钱，就可以办报馆，办了报馆，说话虽然不是完全自由，但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还是相当自由的。现在社会的环境变了，办报馆在个人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像吴鼎昌这样的人自然也就没有了。

胡政之(1889-1949)，名霖，笔名冷观，生于四川华阳(今成都)。胡最初介入大公报是在1916年，当时的大公报为安福系的大财阀王郅隆所操纵，相当于安福系的机关报。尽管胡当时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并没有改变当时的大公报是安福系的机关报这一性质。这一性质导致了后来大公报的萎靡不振，同时，胡也感到大公报与自己的理想有差距，便辞去了大公报，旋而到林白水主持的北京《新社会报》任总编辑。1921年，胡因与林



意见不合，离京南下，过去的人们心态是比较自由的，做工作也比较看重于自己的理想和志趣是不是一致，常常是合则聚不合则散，当时的社会也为这种心态的自由提供了条件，只要有本事，就不怕没饭吃；只要想做事并且有相当才能，就能够做成。同年8月，胡在上海创办了国闻通讯社，后来又创办了《国闻周报》。新记大公报创立之初，很多人手就是从国闻通讯社直接调过来的。吴、张也不以为嫌，那个时候的人们做官也好，做事也好，基本上都有一种坦荡的心胸。这多少令我这个后学晚进有些感慨。今天我们说起这些，不是说过去的社会有多么好，过去的社会也有不好，但是我们怀念过去的好处，是希望这些过去的好处能够得到继承，使我们的今天和明天可以做得比过去更好。

胡在报社的主要事务是经营，但是胡对新闻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反对以前报界那种有闻必录的新闻方式，而是坚持应该把必要的材料摆到读者面前，让他们自由地选择。1943年10月21日，在重庆大公报的编辑会议上，胡有一个讲话，中心思想是办报的人要有政治兴趣而不应该参加实际政治，报纸的最高目标是能代表国民讲话。这话现在看起来一点也不过时，相对于现在与主旋律保持高度一致的、千报一面的报纸，说这话振聋发聩该是不为过的。

在经营方面，胡精心罗致人才，知人善任，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胡是管人事的，但从不把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引进报社，也从来不搞派系。在用人上，胡尽量起用新人，而不是录用那些已经成名的人，在当代报业史、新闻史上大大著名的金庸、徐铸成、萧乾、范长江、杨刚等人，可以说都是由胡发现，由大公报培养起来的。在胡政之的带领下，大公报所有的人都把大公报当成自己的事业，从而奠定了大公报的鼎盛。

胡政之最为人诟病之处是他于1946年11月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当时中共和民盟等党派都拒绝参加，胡本来也是不打算参加的，但是迫于蒋的压力还是出席了会议，但是在签到后的第二日就返回了上海大公报。我们回顾历史，应该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不应该站在今天的角度上对前人做评价，这样评价起来才会比



胡政之

较客观。平心而论，胡参加“国民大会”也无可厚非。苏格拉底对当时的雅典政权指责了一辈子，但当时的雅典政权宣布他的死刑的时候，这位年届古稀的老人放弃了各种逃生的机会，对陷于悲痛的朋友们说：“告诉人们掩埋的只是我的尸体。”胡虽然对当时的政权不满意，但是按照游戏规则其实并没有理由不参加。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胡若拒不参加，大公报就要受到牵连。胡为了大公报，不得不牺牲自

己。与苏格拉底不同的是苏格拉底死后，其开拓西方哲学的知识路线却坚持了下来，正如苏说那样，掩埋的只是他的尸体。而胡做出的牺牲却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并且还为大公报在1949年以后带来了很大麻烦。这其间的差异，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但是苏的就义是在公元前399年，而胡做出个人牺牲则是在1946年，前后相差两千多年。有时候，读读历史，真让人感慨历史老人的偏心。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生于山东邹平，祖籍陕西榆林。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之初，吴、胡、张三人曾有五项约定，其中的第五项就是：“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虽分任撰述，而张先生则负责整理修正之责，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之，三人各各不同时从张先生。”也就是说，大公报的言论，基本上是由张季鸾一个人负责的，大公报的主张同时也体现了张季鸾的主张。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最初就是由张季鸾提出的。

所谓不党，即“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

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连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所谓不卖，即“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所谓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所谓不盲，即“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纵观以后大公报的言论，确实也体现了这“四不”方针。由于大公报的独立立场以及其影响力，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为最佳外国报纸，赠予荣誉奖章，这是我国新闻界第一次获得此种国际荣誉。中国新闻学会和重庆各报联合会为此在重庆举行庆祝会，到会的人员有蒋介石代表贺耀祖以及于右任、吴铁城、王世杰、陈立夫、谷正纲、何应钦代表唐宇纵、美国驻华大使馆



张季鸾

秘书赛维思、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郝戈登、苏联驻华大使武官华德聂柯夫和新闻专员柯瓦烈夫、沙露诺夫、中国新闻学会理事长萧同兹、重庆各报馆联合会总干事陈博生、各报社代表何联奎、陈铭德、康心之、陈敛仁、潘梓年、赵敏恒等三百余人。张季鸾抱病参加了庆祝大会并发表了演讲。张在他生命中最后的这次演讲中表达了两点，其中的一点是谈到“报纸成功之条件或秘诀”，“即不望成功，准备失败，是报人天职，曰忠。曰勇。忠即忠于主张，此则须经过评审研究，不得固执偏见。勇则勇于发表之论，此则须时时准备失败，方能做到勇字”。

庆祝会后，张季鸾卧病不起，于同年9月6日与世长辞。纵观张的一生可谓生荣死哀。其生前出入蒋门从来无须通报，虽不做官但却可以参与国家机密。不过张自始至终也没有失去其文人本色。这也是我们今天怀念张的原因所在。张的为人在其朋辈中有口皆碑，于右任、胡政之等人都对张都有很高的评价。张死后，社会各届纷纷悼唁。蒋介石的唁电是：

“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遽闻俎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怆悼之怀，匪可言罄。”其挽联是：“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祖涵以参政员名义从延安发来唁电：“季鸾先生在国民参政会内会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毋胜悼念。”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为：“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士林所矜式。不意积劳成疾，遽归道山。音响已沉，剗切不再，天才限于中寿，痛悼何堪。特此持唁，敬乞节哀。”

周恩来、邓颖超送挽联为：“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起报人典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土精神。”

同时，国民政府还下褒奖令，中共机关报也发表了题为《季鸾先生对报业的贡献》的短评，都对张极尽褒扬之辞。

国共双方何以都对张有如此高的评价，不否认其中有张的人格魅力